

農民問題

一九四六年七月

一、太平天國土地制度

(摘錄天朝田畝制度)

分田云者：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爲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爲尙中田，以下遞減至四百斤，則爲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各按家口之多寡，士女論男女）以行分田。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隨十五歲以下者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尙尙田五畝，則十五歲以下者半，尙尙田五分，一家六人者則分三畝，田，三人醜田，好醜各半。

查觀天朝民事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壤田畝荒蕪通天，此處荒蕪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蕪，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替田同耕，有衣同穿，有穀同食，無處不均勻，無天不飽，處處同風。

種田天下樹膠下以桑，婦皆織績縫衣裳；每家俱畜母雞五，母雞二，無失其時。

凡天下男女人有妻子女約三西口，或五六七八口，則出家人爲是限，查餘額不爲，疾忍在國者願國庫以養。

凡設軍以後，五家別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得設一兩司馬。

每軍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土。

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

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雖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

凡二十五家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

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

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

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

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這篇文章裏，事實反映得這樣生動，熱情表現得這樣洋溢，每個句子，直到每個字，都浸透着對於革命和勞動人民之無限量的歡喜，對於反革命和吃人的剝削者之不可調和的仇恨。

農民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以及農民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構成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內容。當毛澤東同志寫這個報告的時候，恰是革命的實際運動把這問題放在革命議事日程最突出最迫切的前面，有如其產國際七次擴大會議所說：「土地問題開始緊急起來，成爲現在局面的中心問題。那個階級能夠毅然抓住這個問題而給以澈底的答覆，這個階級就是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就是以無產階級代表者的資格澈底地答覆了這個革命中心問題（在當時又是最迫切的問題）。但是，這全篇不過數千字的報告，不僅明明白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掃清了許多人們頭腦中的混亂，表示了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真正的領袖，而且由此提出了大革命時代一般的革命根本問題，並根據羣衆鬥爭的經驗加以概括，作爲當時全黨布爾塞維克的戰鬥總方向。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之辯論，中曾當刊全報，而爾後則歸門戶之內。

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其經驗及其意見，反轉過來，須向羣衆的本領學，並
是「用這革命的方法論的經驗」。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革命經驗的總結，而與
「自己」的歡喜，充分信任羣衆的力量，乃是把羣衆的辯論當作自己的辯論，是
「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便是拿出充分的勇敢和毅力去迎接他們的學習，使他們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方法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
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的態度吧！又回憶一下，一九〇五年列寧對於俄國武裝的工人階級
的態度吧！這些無產階級的革命，是「衝天」行動，不是責備他們「幼稚」
，不是責備他們「過分」，而是給以滿腔熱情的歡呼，不是隔江觀火，不是自吹自擂，
而是和鬥爭中的羣衆在一起，分析和總結他們鬥爭的經驗，作為他們繼續鬥爭的勝利指
南針。毛澤東同志的態度，和這些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的態度，完全一致。請看毛澤東
同志對於當時湖南農民革命的歌頌：

「……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

論蘇聯的毛。國生等永遠有着一種得不得。論功行實，總算把克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一比較。蘇聯的市民愛護事功功績佔五分，農民愛護革命功績要佔比分的五分之三。蘇聯的市民愛護事功功績佔五分，農民愛護革命功績要佔比分的五分之三。蘇聯的市民愛護事功功績佔五分，農民愛護革命功績要佔比分的五分之三。

一日蘇聯的市民愛護事功功績佔五分，農民愛護革命功績要佔比分的五分之三。蘇聯的市民愛護事功功績佔五分，農民愛護革命功績要佔比分的五分之三。蘇聯的市民愛護事功功績佔五分，農民愛護革命功績要佔比分的五分之三。

新。上。蘇聯、蘇聯建設新生活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在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將。某處與蘇聯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中等的米恩定覺到蘇聯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才來農民，在那裏打翻地獄。們的乾人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

這是農民愛護革命派的理論」。——

……是農民愛護革命派的理論」。——

地方。農民的眼睛裏雖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夠，誰長甚，誰個稍次。誰個德遊婆娘，誰個處男。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割不當罪的極少。——

毛澤東完全為羣衆勞動辯護。但這決不是盲目地辯護。這種辯護完全合乎歷史發展的實際。完全合乎歷史發展的真理。這種辯護是為打倒各種形式的反革命議論所絕對必要的。要羣衆，就必要長羣衆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沒有羣衆的狂風驟雨，決不能有大革命。也決不能完成革命。毛澤東同志就是挺身起來，歌唱羣衆的大風雨，並且是對於羣衆進行了呼風喚雨的工作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你說羣衆的狂風驟雨太粗暴了嗎？對不起！你要懂得革命嗎？這就是真正的革命！我們就是歌唱這樣的革命！毛澤東同

在這篇文章中，對於革命，給了一個絕妙的科學先詞，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羣衆，形成這個大的力量』。

你說羣衆會『過分』嗎？羣衆會『矯枉過正』嗎？不錯，毛澤東同志回答說：『……

那些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農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但是，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實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毛澤東同志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大革命中從羣衆鬥爭的經驗所發現的一個重要的客觀革命規律。這是羣衆革命鬥爭的客觀辯證法。革命者的領導方針，是着眼在領導羣衆起來去『矯枉』，並不是要去故意製造『過正』。不過，這裏的問題是在於：要領導羣衆起來，首先就應該放（讓）羣衆起來，而一旦羣衆起來，就會向他們的累代世襲的壓迫者發洩其鬱積的怨憤，就會有所『過正』。這種客觀情況的發展，對於革命者說來，並不是可怕的。革命者不能因此就事先去束縛羣衆的手足，阻止羣衆起來。應該了解：在鬥爭中羣衆也可能有些錯誤，但應該讓羣衆

衆在鬥爭中學習自己的本領，並學習改正自己可能犯的錯誤。

在物理活動的現象中，我們時常碰到這樣的規律，即事物的某些運動（這裏是說運動的一種形式，不是說運動的一切形式），在達到它的目的或定下它的重心之前，時常要或多或少越過它的目的或它的重心。在羣衆革命活動的現象中，也有這樣的規律。列寧在『左派』幼稚病說到普列哈諾夫替法國大革命辯護這件事。普列哈諾夫是這樣寫的：『比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更加厲害的恐怖，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把真正的金剛力士抬出歷史舞台，它好像『天上的雷雨風暴一樣』光臨法國，它無情地破壞了『舊制度』底一切殘餘。……它的力量乃是人民革命運動的力量，主張恐怖人們策略上的主要特點，就是無論如何總要設法維持和加強羣衆的革命自動精神。這種恐怖，並不是由於對羣衆運動底力量發生『失望心理』所引起的，而是相反的，是由毫不動搖的、相信這種力量的信念所引起的。當普列哈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他是這麼寫的。這是一個羣衆路線的問題。爲着實行『矯枉』而讓羣衆起來呢？還是爲着避免『過正』而阻止羣衆起來呢？革命者在這裏就要有所選擇了。

在大革命時代，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這種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方法論相反，還有一種方法論，這就是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孟塞維克的方法論。這種人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時常所稱爲『本本主義』的人。他們口頭也時常談到『革命』、『革命』、『革命』，特別對羣衆還沒有大發動的時候，他們甚至可以把自己描寫爲了不起的『革命家』，或『革命英雄』，但當

是在書房中製造「革命」的計劃、繪畫「革命」的圖案、而叱咤羣衆要去按照他們的計劃或圖式走路。如果羣衆鬥爭有點走樣，即走出了他們的計劃和圖案的時候，特別是當羣衆大發動，而根據自己的意志，去「衝決一切縛束他們的羅網」的時候，那些「本主義」的人就會始而驚呼：「嚇！嚇！你們果真幹起來嗎？得點慢點！我還有錦囊妙計呢！讓我先和敵人談判談判吧！你們且息一息吧！一繼而生氣：「呸！你們胡鬧！你們完全沒有知識，為什麼不聽我的命令呢？」終而搖頭嘆息和咒詛：「世事大變了，真是無法無天，眼看要出亂子了，沒有辦法！沒有辦法！讓你們去待禍吧！」如果羣衆果真失敗了，那末，他們的理由就更多了，神氣就更十足了：「活該！我老早就算到了，不聽我的話，苦該有這樣的結果！」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說：「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當不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當然，不但革命戰爭是這樣，各種羣衆的革命活動也都時常是這樣。但這種真理對於「本主義」的人，是格格不相入的。他們說：「世界上那裏會有這等事呢！世界上是書本出革命，那裏是會革命出書本呢？」這類人一方面害怕革命的恐怖，另一方面害怕革命的恐怖，而且，害怕革命的恐怖，比起害怕反革命的恐怖，是要更厲害得多。所以，他們不會贊助羣衆自我的革命行動，也決不肯向革命的羣衆開火。最後，也就要從革命的隊伍中離開出去。

當農民運動開始發動的時候，陳獨秀所寫的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一）

九三六年九月）就要給農民運動劃定界限。他在那裏寫道：「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往往敵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損失」。羣衆剛在起來，連陳獨秀自己也承認，那時還未打到敵人，但是陳獨秀却已不耐煩了，大喊「過左」了。羣衆運動剛在活躍的有利時機，反革命則在設法抵抗，但是陳獨秀却倒轉說是「自己已受很大的損失」，以作爲限制農民運動的藉口了。陳獨秀又在那裏寫道：「當地主與貧農有衝突時，應設法使舊農會（大革命以前士劣所操縱的合法機關）居調停地位」。陳獨秀對於農村問題的解決，不是要取決於農民羣衆的鬥爭，而是要取決於舊農會的調停。調停——這是陳獨秀的根本觀念，這個根本觀念就是漠視羣衆、限制羣衆和否認羣衆的觀念，就是孟塞維克的方法論。當一種革命的新事物從羣衆那裏發現出來的時候，陳獨秀不是給以正視，衷心地去歡迎它，而是不敢正視，對它表示煩燥。請把陳獨秀這種態度和毛澤東同志的態度比一比吧！孟塞維克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分別，真是太顯然了。

羣衆的革命規模前走一步，孟塞維克就要後退一步。兩者背道而馳——這是一種規律。偉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在大革命中先後進行了世界上可歌可泣的鬥爭；在英勇的共產黨員領導下，武漢工人階級的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階級的流血起義——這兩件繼廣東工人階級省港罷工之後而爲大革命重要組成部份的羣衆英雄事業，不是給陳獨秀這類孟塞維克們歡喜，而是給他們煩惱；偉大的湖南農民革命，又是給他們煩惱再加上一個煩

慘痛教訓（一月二十一日）反革命事變之後，湖南農民英勇的武裝起義領導下向長沙進軍，這是一個偉大的進軍，根據當時力量的對比，這個進軍本來是可以獲得勝利的，但是機會主義者却向勝利的進軍作了失敗的退軍之決定，打散了羣衆的英雄主義，瓦解了羣衆的革命隊伍，擴大了反革命的毒餌，助長了反革命野心，這是對於革命的極可恥的沒有氣節的決定。這是武漢政府時代一個重大的歷史關節，也是大革命失敗一個重大而歷史關節。接着各種可恥的遏止農民羣衆革命發動的通告就出來了（參考八七會議告全國黨員書），自動的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了，解散勞動童子團了。這一切都是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當時全黨許多多的布爾塞維克精神相反。這一切都是陳獨秀孟憲承克們畏懼羣衆革命發動的不可避免的可恥結果。

積極擁護羣衆的自發革命發動和革命創造——這種布爾塞維克主義，和自動主義有天淵之別。自動主義的特點是脫離羣衆；脫離羣衆的孤立胡幹（像大革命失敗後和內戰某些時候那些『左』傾機會主義所幹的），不能幫助羣衆發揚革命英雄主義，而且適足損傷羣衆的革命銳氣（因為必然失敗）。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特點則是聯系（結合）羣衆，和羣衆一起來幹，在其決定行動之前，首先就要估計到羣衆的情緒、組織、力量之配備，以及羣衆四周的各種條件，不落在羣衆的鬥爭之後，而又一步一步地根據實際的鬥爭提高羣衆的革命英雄主義，引進羣衆到勝利的道路。

布爾塞維克主義又和尾巴主義相反。尾巴主義的特點就是盲目地附和於羣衆之

後，或者從右方面去附和，或者從「左」方面去附和，不能根據羣衆鬥爭的經驗加以概括，去幫助羣衆獲得自己明確的方向，反而使得羣衆可能迷失方向，陷於失敗。這也是脫離羣衆的一種形式。布爾塞維克主義不同，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所以成爲無產階級和一切革命人民先鋒隊的思想，就是因爲它是生動地概括羣衆鬥爭的經驗，集中羣衆的意見，不但吸取羣衆鬥爭中一切優良的光進的東西，而且也捨棄羣衆中那一切由於階級壓迫和迷信，因襲而產生的某種不好的落後的東西，向他們提出明確的方向，考慮鬥爭中進攻與防守的各種場合，規定隨機應變的具體戰略和策略，糾正他們可能犯的錯誤，這一切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這篇文章中的所謂「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換句話說：布爾塞維克之所以爲布爾塞維克，還不但是因爲和羣衆在一起，而且更因爲是羣衆的領導者。我們常有許多這樣的布爾塞維克，所以就能創造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官動主義和尾巴主義在實際上都是孟塞維克的種類。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中國布爾塞維克主義，就是在和中國孟塞維克及其一切變種的鬥爭中逐步成長起來，成爲不可戰勝的旗幟。

二 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農民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文章中開章明義這樣提出問題：

「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

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雨驟，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羈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批評他們呢？這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的命運將強迫你迅速的選擇罷了。」

問題提的這樣明白，這樣確定，這樣斬釘斷鐵。文章發表後幾個月間所經歷的事變，完全把上述的思想證明了。十餘年來，革命與反革命的一切最終離合，不但沒有推翻毛澤東同志的論斷，並且益發表現出毛澤東同志的每個字句光景如新。一種理論的是否正確，必要看它能否經得起實際的考驗，那末，我們對於毛澤東同志的理論，正是作如是觀的。

為什麼對於農民革命的態度乃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最終試金石呢？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社會結構回答了這個問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既然是這樣，那末，打爛這個基礎，打平這個牆腳，就是踏平反帝反封建勝利的道路，而維護這個基礎，維護這個牆腳，也就是維護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所以毛澤東同志說：「這個打爛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靠誰來打爛這個基礎，打平這個牆腳呢？就是靠農民起來，靠農民

革命。你說你贊成反帝反封建嗎？但只要你不是贊成農民起來，不是贊成農民革命，那末，即使你自己主觀上不是要做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辯護人，但也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俘虜了。

中國是這樣偉大的農民國度，農業人口在全國人口中佔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二千餘年來，農民戰爭乃是中國歷史發展真正的動力。在百年來的近代中國，這農民大眾的政治動態，仍然是決定民族命運的基本政治動態。在近代中國無產階級產生之前，這個農民階級的鬥爭缺乏自己的領導者而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但自從近代中國無產階級出現之後，農民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已遠非昔比，而是更富戰鬥力，接近於自己最後解放的道路了。毛澤東同志對於大革命這樣估量：「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這也就是說：農民在政治上比重的重大，同時也正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領導的結果。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治必須是農民的革命政治，革命軍事必須是農民的革命軍事，革命宣傳必須是農民的革命宣傳，革命文化必須是農民的革命文化。中國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進行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或國共合作，歸根到底，是爲着引到農民的發動：中國無產階級領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領導的階級範圍是很廣泛的（在某一定時期連資產階級也是被領導在內的，即當資產階級需要革命的時期，它就需要無產階級的領導，如過去大革命時期，現在抗日時期），但基本上必須依靠取得對於農民的

領導階級，決不會落空；最後，中國無產階級要從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完全必須把農民大眾引到自己方面來，而後才是可能的。直言之，若沒有農民真正的翻身，則沒有中國民族真正的翻身，而若是中國無產階級不能領導農民革命，則決不能成就民族的和無產階級的事業。根據上述種種，毛澤東同志號召共產黨及一切革命同志要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農民；「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運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運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一個運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運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果真，大革命時代，國民黨內的蔣介石，汪精衛不擁護這個運動，就先後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藏在共產黨內的孟憲承、陳獨秀、彭述之不擁護這個運動，最後也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當時關於農民運動是存在了兩條路線：一條是革命的路線，一條是改良的路線，後一條路線是在農民起來之後，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作為對抗前一條路線而形成起來的，實際上即反革命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報告說：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乃慣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與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運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

農運的革命派和農運的改良派的鬥爭，反映到當時我們黨內，就是成為毛澤東所代表的布爾塞維克路線和陳獨秀所代表的孟塞維克路線的鬥爭。農運的改良派，即農運的反革命派——所謂「榆木」的，毛澤東同志則稱之為「革命元勳」。毛澤東同志熱烈地讚美他們「反黨」，因為沒有他們反黨，就沒有農村革命。

據長沙的調查，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富農佔百分之十。……這個貧農、中農、富農的分配，乃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達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特別是赤貧部分），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等級農協（即鄉協）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二、第三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土豪劣紳在土地，並且踏上一隻腳。……毛澤東同志這裏首先做重圍鐵錘的階級分析，並由此得出了農村革命戰略和策略的結論。這是農運的真正革命路線。農民中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必須成為農運的中堅。……從秘密時期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裏奮鬥，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

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的向土豪劣紳營壘攻擊，『一切破壞的工作都只有他們做得出』。擁護農村革命的人，必須首先擁護他們的革命行動，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報告中所反覆說了的：『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過分』舉動，實在是正是革命的需要』。可是陳獨秀恰恰就是因為他們這類『過分』舉動，對於農運採取了『因噎廢食』的政策。陳獨秀的基本口號就是：『不能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這個口號完全是適合了農運反革命派的脾胃。

列寧的兩個策略對於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策略，曾經這樣寫道：

『先生們！二者必取其一：或者我們與人民共同努力實行革命，完全推翻專制制度，而不去顧慮不徹底的、自私的、怯懦的資產階級；或者是我們不容許這類『不顧慮』，我們害怕資產階級離開革命，那時，我們就會把無產階級和人民出賣給不徹底的、自私的、怯懦的資產階級』。

大家都知道：當時陳獨秀所最戰戰兢兢的，是害怕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戰線，因而害怕農民革命。對的，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是和俄國資產階級不同的，中國資產階級在革命的一方面，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策略和俄國無產階級有很大不同：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了統一戰線，這統一戰線是正確的，必需的；當農民還沒有起來的時候，更必需充分注意去照顧它；但當農民起來之後，而資產階級（即毛澤東同志所稱『國民黨右派』）恰是反對農民起來，多方阻止無產階級與農民結合，並